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博士学术文库
基础韩国语教学团队

资助出版

● 杨磊 著

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管窥

——《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的比较研究

증한비교문학연구 관규

〈黑骏马〉와 〈雾津纪行〉의 비교연구



NLIC297080380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RESS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博士学术文库

基础韩国语教学团队

资助出版

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管窥

——《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的比较研究

杨 磊 著



NLIC2970803805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管窥:《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的比较研究/杨磊
著.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023-7076-3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小说研究:对比研究-中国、韩国-
现代 IV. ①I207.42 ②I312.6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5374 号

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管窥 ——《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的比较研究

策划编辑:周国臻

责任编辑:周国臻

责任出版:王杰馨

出版者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复兴路 15 号 邮编 100038

编务部 (010)58882938, 58882087(传真)

发行部 (010)58882868, 58882866(传真)

邮购部 (010)58882873

网址 <http://www.stdp.com.cn>

发行者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者 北京高迪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开

字数 150 千

印张 6.25 彩插 4 面

书号 ISBN 978-7-5023-7076-3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字迹不清、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言：比较文学与第三种文学批评

杨乃乔¹

杨磊是一位执著的青年比较文学研究者，我与他的结识是在复旦大学。2011年6月27日至7月2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联袂举办“阅读中国翻译史：第二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地点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他参加了此次“暑期班”。当时，我在帮助王宏志教授处理“暑期班”的一些学术与管理事务，也因此与杨磊有了多次的接触，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在真诚中流露出的一种学者的谦卑与睿智。“暑期班”结束后，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不久，我从电邮上收到他传递过来的大著《中韩比较文学管窥——〈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的比较研究》。

凭心而论，我对中韩比较文学在研究上没有多少感性的学术体验，只是在编写《比较诗学概论》时曾向延边大学的徐东日教授请教过“中韩比较诗学”一章如何撰写而已，并在他那里收获了很多启示。然而，学术研究方向的距离感却对我更有着一种诱惑，这大概是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我知识结构中所沉积的阅读惯性，长久以来，我特别有兴趣走进与我的研究可能产生交集的领域，以此把自己知识的逻辑在扩展中有效地

1 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向外链接；所以，我有兴趣拜读这部著作，也希望了解杨磊关于中韩比较文学的思考能够在怎样的研究交集中产生怎样的究竟。的确，这部著作具有几个重要的学术特点引起我对比较文学及其学科理论的一些思考。

众所周知，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不自觉地获有一种命定，他们是在跨界的阅读与书写中汇通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及其相关文学艺术现象的，并以此来整合自己的思考，这里的“跨界”行动已经被比较文学教科书浓缩为一个暂且不可更改的学理性规范：即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杨磊曾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师从全炯俊教授攻读硕士，这部著作是建基于他的硕士论文所给出的进一步深度化扩展，当时，他是使用韩语书写硕士论文的；毕业回国后至今，他又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韩语系任教了8年。从这部使用中韩双语书写与出版的著作来评判，显而易见，他的优秀的韩语能力为他从事中韩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方向的重要界分点之一，就是在研究方面对语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国族文学研究者是在本土的立场上对母语书写的文学现象给出自己的阅读与思考，而这种阅读及思考的逻辑是与本民族语言背后的思维观念及思维惯性链接在一起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42-)在《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中言举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时说明了这一点：“雅克·德里达是哲学家中的天才，他认为‘哲学观念不可能超越习惯的差异。’这种领悟力

不仅仅适用于法语、德语，或者希腊语和拉丁语。”¹因此，从国族语言及其思维观念的链接逻辑来看，阅读与思考的文化亲缘性及无障碍性则是国族文学研究的显在特点。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文学研究一旦跨出本土语言，走向国际化，与另外一种国族语言书写的文学现象遭遇，问题就复杂且丰富了起来；在两种语言的思维观念形成的各自惯性系统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在双项汇通中寻找共生的平衡与生存的第三种立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²

一种文学现象及其作家作品被国族文学研究持续关注了多年后，往往研究者在材料与义理两个方面对其投入的研究是穷尽式的或终结式的，很多文学现象及其作家作品在研究方面往往被宣判为一种相对性的终结，其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不再具有研究的选择性与热点性。这种情况在国族文学研究领域中很普遍，至少我知道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承志的《黑骏马》就是一例。

1 [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一门学科的死亡》(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按：斯皮瓦克在这里引用德里达《给予时间》中的表述形成了一个判断：“哲学观念不可能超越习惯的差异”(philosophical concepts [cannot] transcend idiomatic differences.)此句引文见于雅克·德里达著：《给予时间》(Jacques Derrida, *Given Time: I. Counterfeit Money*, tr. Peggy Kamu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54; the next reference is to 67.)。从斯皮瓦克引用此句表述的上下文看，这里“习惯的差异”是指不同语言之观念所形成的习惯差异，因此，斯皮瓦克紧接着在下文提到了“法语、德语，或者希腊语和拉丁语”。

2 按：语言是一种书写使意义出场的符号，而形成语言这种书写符号的内在驱力是一个民族久远以来沉积在文明、文化与历史中铸成的思维观念与思维惯性。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跨语际的思考中，是以有限的生命对两个民族语言背后久远的思维意识与思维惯性做汇通性调整，以形成第三种批评的姿态。

在青少年时代,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与其他同龄人一样,都曾是在迷惘在苦涩中寻找精神出路的文学青年,似乎文学是那个刚刚走出“红色宗教”之时代的唯一精神寄托。伤痕文学曾伴随着我的阅读一路地书写向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可以说,律动在这三脉文学思潮下的主流作品都不曾在我的阅读生活中缺席过,而张承志《黑骏马》的推出,着实把我摄入北方草原的另一种风俗叙事中深深地震动了;张承志在一首古老而舒缓的蒙古民歌长调中讲述了一段凄婉缠绵的爱情故事,这段爱情在传统愚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把我从伤痕与反思中带向了对文化与民俗的思考。《黑骏马》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曾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所讨论的热点文学现象,许多优秀的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曾以自己的批评与研究来深度地诠释过这部中篇小说,最终,张承志及其《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等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硕士生与博士生选题的热点。但是,时值20世纪的90年代,学界关于张承志及《黑骏马》的研究不断地在选题上撞车、在结论上重复,从某种程度上客观地讲,至少张承志的《黑骏马》已经处于过度研究的饱和状态了。

H. R. 姚斯 (Hans Robert Jauss, 1921—) 和 W. 伊泽尔 (Wolfgang Iser, 1922—2007) 曾以接受美学 (Receptional Aesthetic) 的逻辑力量来论证小说文本的无限敞开性,让阅读在小说文本的空白点中可能性地提取无限的意义,以反对文学研究的历史客观主义。¹我在这里借用接受美学的理论在陈述

1 按:比较文学研究的法国学派就是持历史客观主义的姿态。

上制造一个反讽的话语：有趣的是，《黑骏马》作为一个文本已经向那个时段的过度研究给出了封闭的姿态，其不再具有意义提取的空白点了，这部小说文本因过度研究向学界宣布了关闭。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言说“过度研究”绝然不是意大利符号学与诠释学研究者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 1932—）所论述的“过度诠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以过度研究使一部小说跌向文本的关闭，这一定是学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并且时值21世纪，在后现代国际大众传媒及后数码工业文明制造的大众文化的娱乐性与媚俗性中，《黑骏马》更为70后、80后与90后的生存者所无知，沉寂为一部孤独已久的经典了。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从文学艺术的历史性美学品质上来评判，经典一定是孤独的，并且经典再孤独也必然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当然，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我在这里并不希望奢谈历史记忆理论及其在价值选择中呈现的史学功能问题，也更不想多谈历史记忆理论对文学研究应该有着怎样的可能性推动，而是想说，杨磊正是以比较文学研究置换了一个视域，让自己的研究从本土语境跨出去，在一个跨语际的阅读与思考中再度激活了《黑骏马》。

当然，杨磊不是一位纯粹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他是把韩国现代偶像派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带入自己的研究中，与张承志的《黑骏马》形成一种跨语际的参照性思考，同时，这种跨语际的参照性思考也再度激活了《雾津纪行》。当然，比较文学研究对两部以上不同国族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激活，一定是互动性同步的，所以比较文学视域在这里不可或缺地生成了。

我们知道,《雾津纪行》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称誉,这部小说曾被韩国本土文学批评者评价为那个时代小说创作的一次“感受性的革命”,金承钰也被被誉为韩国20世纪60年代文坛上的“Icon”——偶像。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两个术语在中韩两国学界有着各自文学史观的时限性界定,如果我们走向一种世界文学史观,放大了来讲,《雾津纪行》与《黑骏马》是在全球史观下同期先后创作的两部小说。从中韩两个民族文学发展史几乎同期的时空对位上来看视,杨磊这部著作的选题不仅刻意而且精致,他把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两部小说整合在自己的比较视域中,这不仅表明他拥有很好的跨语际学术研究能力,也表明他能够把这两部小说及其叙述的相关历史事件、社会政治、民族风俗与人物形象整合在自己的中韩双语书写中,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对《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给出自己不同于各自国族文学批评下的结论。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在本土对《黑骏马》所进行的研究是一种本土文学批评,同样,韩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本土对《雾津纪行》所进行的研究也是一种本土文学批评;那么,杨磊在跨语际中对《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的整合性思考,在中韩比较文学研究中形成了第三种文学批评。

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 1903—1995)与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 1899—1986)在他们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读本中,把文学研究界分为三个层面: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实际上,比较文学在总体的研究面向上也可以相应地界分为这三个层面:国际文学关系史、国际文学批

评与国际文学理论。首先，我们在这里指出：国际文学理论就是比较诗学。然后，提请学界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即“第三种文学批评”。在国际文学批评的面向上，第三种文学批评就是建基于两种以上国族文学研究所形成的比较文学批评；需要进一步诠释的是，我们在这里启用了“比较文学批评”这样一个概念，以此在细微的差异上区别于“比较文学研究”。如果我们再度精细地划分“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批评”这两个术语，它们是包涵与被包涵的逻辑关系。比较文学批评就是文学批评的国际化或国际化的文学批评，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二个面向就是跨语际的第三种文学批评。

2003年，我在北京工作时，全国一批优秀的学者曾集结在一起编撰《比较诗学概论》；在撰写《比较诗学概论》的大纲时，我曾第一次提出过“第三种诗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导源于我对“跨界的文学理论国际化研究”的反思。在本质上，第三种文学批评与第三种诗学在学理的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前者归属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划定的文学批评，后者归属文学理论。

当然，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语际的跨界中的确不可遏制地获取一种全球化的研究视域，同时，这也必然加大了文学研究的难度。当下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国际化，所以比较文学研究也必然携带着诸种争议成为这个时代的显学，并且比较文学为守护自身显学的前卫性又不得不持有一种防守性姿态，以捍卫自己学科的合法性。但无论如

何，我想在国内已经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中，同时用双语书写与出版的著作还是为数不多的，尤其是用中韩双语书写与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著作恐怕还是第一部。这也是杨磊这部著作的学术特色所在。

提及跨界与双语的问题，我又想起了美国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在1962年推出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托马斯·S·库恩以“范式”(paradigm)与“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两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求证，阐明了科学革命的显著特征在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存有的不可通约性，托马斯·S·库恩的理论曾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观念性革命的地震。当然，还有一位重要的同期学者给予托马斯·S·库恩于理论上的推波助澜，他就是被称之为“科学理论界的肆无忌惮者”的美国科学哲学家P·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 1924—1994)。多年来，我一直在持续地阅读上述两位科学哲学家的理论，并不时地在阅读中体验因思维观念的革命而带来的启示。我深切地感受到，倘若把他们的理论带入到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及翻译研究的理论建设，其可以让我们站在一个崭新的思维观念上，重新审视我们现在所正在从事的研究领域及其学科理论。

实际上，我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每一个国族都因自身独特语言的操用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律性文化系统，每一个国族的语言文化系统在历史的记忆中沉积为一种“图式化阻力”(patterned resistance)，这种图式化阻力是以本国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宗教、风俗、社会、政治、伦理及经济等形成的结构化与模式化的范式，并对另外一个国族沉积的范

式给予自发性的阻抗，最终以凸现这个国族的唯一性与自主性。一种文学的民族风格就是差异于另一种文学民族风格的阻抗性与自主性的范式，并且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当然，我们在这里是从文化相对论的视域来言谈文学国族风格的不可通约性的，我们一定不是一位民族孤立主义者。我们只是希望从学理上求证，国族与国族之间的确存在着范式的阻抗，在范式的阻抗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注意，在此我们是于历史的共时性上来言谈文学民族风格的不可通约性的。

当然，托马斯·S.库恩和P.费耶阿本德是在历史的历时性上指涉科学革命前后的范式之间存在着绝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因此在“革命”(revolution)与“后革命”(after revolution)之间的范式中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我们化用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的观念言称：即在“理论”的范式与“后理论”的范式之间存在着“向这一切说再见”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划分出了两个时代。其实，我们不是在这里把范式与不可通约性的理论拿过来，硬性地诠释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学科理论，而是在我们的使用中再度丰富与改写这一理论，让西方托马斯·S.库恩和P.费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约性理论与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以通约(commensurability)，以形成一个具有互文性的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¹我们在这里使用范式与不可通约的理论，无疑是在反讽中与托马

1 按：托马斯·S.库恩在其理论的构建中讨论了翻译的不可通约性，但是，他是从同一文化传统中科学革命前后的范式来谈的，其所关涉的是历时性的讨论；我们挪用与改写这个理论，是从跨国族的两种不同语言来谈的，我们关涉的是共时性的讨论。

斯·S·库恩和P·费耶阿本德进行对话。不幸的是,1983年,托马斯·S·库恩发表了《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 Communicability”)一文对他前期的立场进行了修正与调整。

其实,比较文学在其学科理论的本质上一一定是反对不可通约性的,不可通约性的宣称在历史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面向上,过于强调了一方时空的自足性与孤立性。的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中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文学批评体系中的《雾津纪行》在各自的批评体系中有着自己本土的“范式”,如果我们强调其两者之间没有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两者是在研究中不可通约的,我们一定会坠落于文化孤立主义的泥沼中,成为一位文化原教旨主义者。而我们借用杨磊的著作来说,他的研究正是突围于这两部小说文本的各自“范式”,并且操用双语书写,在可通约性中达向两种范式知识的渐进积累,这种知识的渐进积累呈现在比较文学研究者跨界于两种以上的国族文学研究领域,给出一种整合式的第三种比较文学批评。¹

正因为比较文学在遭遇全球化态势的敞开中其学科边界正在消失,所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特别需要准确的学科意识,

1 按: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使用了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另外一位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这21种范式给予了总纳,并概括为三种类型;其中第二种类型即是指涉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属于社会学范式。我们可以把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托马斯·S·库恩总纳的第二类型范式——社会学范式带入文学研究领域;具体的说,文学研究方向下的每一个二级学科、每一个具体研究方向在不同的语境下都可以形成自己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存在着自身的语言、传统等社会学元素。

这一点是我们反复需要强调的，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不同于国族文学研究的关键点所在。我注意到杨磊在把《黑骏马》与《雾津纪行》整合在中韩双语中进行研究时，他有着自觉的学科意识。的确，从纯正的法国学派研究方法论来看视，《黑骏马》与《雾津纪行》这两部小说依凭的创作背景都是纯粹本土性的，两部文本之间没有发生过历史、文化、风俗与社会等元素的影响性直接碰撞与对话，也就是说，这两部小说绝然不是法国学派意义上的间性文本（intertext），所以採用法国学派跨语际性的材料考据方法论对这两部小说进行研究，在这里是不奏效的。有趣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于国际文学批评的面向上，批评者往往面对的跨语际诠释对象由于没有遭遇直接的碰撞与对话，材料的整理、校勘、辑佚、注释的考据方法论往往不可奏效，因此，在两部文本的间际中追寻具有人类审美共通性的义理，也必须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论，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即是如此。

杨磊强调自己的研究是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方法论上展开的，这部著作透过中韩六七十年代一段曾经相似的历史背景，在思考中着力打造了一个平行研究的逻辑结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上，张承志是占据一个角色的文风如铁的硬汉，他是一位在青少年时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及“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作家；金承钰是20世纪60年代韩国现代文坛上崛起的“Icon”，他是在幼年经历过“六二五战争”的“四一九一代作家”；《黑骏马》的白音宝力格是从草原走出的“知识分子”，《雾津纪行》的尹熙重

是从乡村走入都市的“知识分子”，两人都生存在各自本土语境铸就的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愚昧与文明的张力中；杨磊启用“疏离感”与“回归母体意识”两个重要的理论陈述，把白音宝力格与尹熙重置放于对两种差异性文化的汇通性思考中，把两个人物形象归属到一个具有共同类型的结论中，那就是中韩“归乡小说”中的同类型人物。

也正是如此，这部著作促成了具有浓烈中国在地气息的文学作品与毗邻的韩国文学作品的一次跨国对话，这种跨国对话把这两部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及他们背负的历史与命运，置放在整个东亚现代化进程的视角下去观察和探讨。由于这部著作是启用中韩双语书写的，通过对这部著作的阅读，中国读者可以凭借自己所熟悉的《黑骏马》及白音宝力格走向《雾津纪行》及尹熙重，进而走向对韩国那个年代的历史与命运的了解，即那批知识分子无论是在记忆与现实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六二五战争”、“四一九革命”、“五一六军事政变”，以及朴正熙军事独裁政权与经济开发政策等；韩国读者也可以凭借自己所熟悉的《雾津纪行》及尹熙重走向《黑骏马》与白音宝力格，进而走向对中国那个年代的历史与命运的了解，即那批知识青年在信仰与精神双重维度压迫于红色政治的权力话语下，他们怎样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等极左的红色风暴等。

平行研究的确不在于对两部小说一眼看上去具有相似性的叙事情节、人物形象等元素进行 $X+Y=Z$ 的类比，更在于透过两部小说叙事表象背后的历史、文化与风情，给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汇通性与深度性思考，以形成第三种文学批评。第三

种文学批评就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跨界的立场上，对两个以上的国族文学进行汇通性思考所形成的一个崭新的共同体空间，我们在这里具体地说，这个共同体空间是在两种不同国族文学各自独立的立场上，以整合而构建起来的学术研究领域，在这方学术研究领域中，两种国族文学之语言背后的思维观念及思维惯性在逻辑上链接在一起了。非常有趣的是，这里潜在着一个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学科理论，杨磊关于《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的平行研究让这两部小说跨越中韩语际遭遇了、对话了，在中韩比较文学研究史上，这是一个学术事件。如果若干年后，再有其他学者对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这个时代关于这两部小说的平行研究，为后来这两部小说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双项接触的历史依据。我们注意到，关于中韩这两部小说的平行比较研究，也被同期的韩国青年学者所关注，2006年12月30日，“复旦大学—韩国外大‘BK21新韩中文化战略事业团’国际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这也是第一届中韩青年比较文学研究者共同参与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硕士生金旼劲发表的论题就是：“金承钰《雾津纪行》与张承志《黑骏马》中的‘还乡’主题对比研究”。

也就是说，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理论来看视，前一个时代关于两部国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一定是后一个时代关于两部国族文学影响研究的材料依据；因此，切不要在一个简单的逻辑上小视了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

其实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部不同国族的小说在各自的本土都曾被本国族的前卫电影导演所关注过，并把其作为脚本依借电影的镜头艺术语言再度诠释。一种文学艺术的创作及改编的现象可能会在绝然不同的国族历史中惊人地重复，这是全球历史的共通性。金洙容是韩国著名的电影导演，被被誉为韩国的安东尼奥尼。1967年，在小说《雾津纪行》的基础上，他以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镜头语言拍摄了《雾》这部电影，揭示了在韩国社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中男性心理的不可承受之重及复杂性，也表现了尹熙重因心理劳顿所遭遇的精神错裂等文化心理因素。谢飞是中国第四代著名电影导演，他曾以昙花的瞬间绽放在第三代导演与第五代导演的代际转型中留下了自己的美丽与高傲。1995年，在小说《黑骏马》的基础上，他曾以蒙古民歌长调的叙事风格书写了《爱在草原的天空》这部电影诗，并荣获第十九届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导演”及“最佳音乐艺术成就奖”，这部诗性的电影结构在抒情的大远景与空镜头等镜头语言中，让白音宝力格背负着感恩的乡愁与苦涩的缅怀，凝重且舒缓地行走在大草原的音画叙事中。《雾》与《爱在草原的天空》两部电影都执著于各自本土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投射出迷人的魅力。

也就是说，无论是小说的本然，还是从小说到电影，把这两部小说带向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视域中，给出互为参照式的阅读与思考，其必然有着这一课题成立的学理依据，也获有在审美逻辑上维系两者的普遍学理性。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证明了，比较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学研究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推动。我也注意到，以往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的选题主要是定位在